

## 明代南京朝天宮建築格局的變遷及其意蘊\*

賀晏然

### 摘要

南京朝天宮是明代最重要的官方道教宮觀之一。朝天宮深厚的歷史積澱和繁複的宗教與政治功能決定了其建築格局的複雜性。朝天宮的新修建築及其與舊有建築的共處情況，既受到明代地方宗教教派發展的影響，也反映了明代道教管理的政治設想，但此前宗教和歷史學界對明代南京朝天宮均關注較少。本文通過梳理南京朝天宮明代建築格局的變化，希望在釐清明代朝天宮建築歷史的基礎上，揭示這一重要的道教宮觀的建築格局與政治、宗教、社會環境之間的多元聯繫。

關鍵詞：南京、明代、道教、朝天宮

---

賀晏然，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現任南京東南大學歷史系講師，兼任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榮譽副研究員。研究興趣為明清思想史、明清道教史。

\* 本文為東南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人的寶貴意見。

## 引言

南京朝天宮是明初最重要的官方道教宮觀，「朝天」取「以奉上帝，以展祈報」之意。<sup>1</sup>朝天宮建築是以道教宮觀為主體的建築群的統稱。在明太祖定都金陵之前，朝天宮其地就以道觀的身份傳承了數代。「朝天宮其地，即吳冶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始置總明觀。唐建紫極宮。宋真宗大中祥符間改祥符宮，尋改天慶觀。元元貞時，改玄妙觀。文宗時，又改永壽宮。」<sup>2</sup>隨著元代朝天宮宗教地位的上升，其以三清殿為中心的道觀形制在明代以前就已較為完備。洪武年間的增建，在豐富道教建築的同時，主要是為了使朝天宮建築更加適應百官習儀和道教管理的需要，擁有了宗教和政治的多種功能。

明代南京朝天宮建築的發展受到洪武年間（1368–1399）朝天宮建築格局的深重影響，但也反映了地方道教宗派長期以來的發展特點。朝天宮的主體道教殿堂、附屬於道觀的西山道院、全真堂和道錄司都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過程。這其中既牽涉道派之間的競合關係，也有宗教與政治之間的複雜互動。到了晚明，形成了主體殿堂與西山道院並峙，道錄司和全真堂漸趨衰落的景象。同時，作為世俗景觀的朝天宮東山逐漸進入文士和本地居民的視野，使得朝天宮建築在原有的政治和宗教功能之外，又增添了景觀的功能。

作為明代南都最重要的官方道觀，朝天宮建築的變遷反映了明代南都道教發展的狀況，也展現了不同的道教勢力在宮觀內運作的情況，是研究明代道教宮觀歷史不可多得的個案。目前學界對明代南都的道教研究較為缺乏，對代表明代南京道教狀況的官方宮觀朝天宮的專門研究幾乎沒有。僅有的幾篇綜述性的研究問題較多，對明代建築細節的處理也較籠統。<sup>3</sup>本研究深入南京明代城市道教的細節，重新

<sup>1</sup> 〈御製朝天宮新建碑〉，收入[明]沈榜：《宛署雜記》，卷十八（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頁195–196。

<sup>2</sup>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六十三（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頁2523。

<sup>3</sup> 李顯光：〈南京朝天宮的探索〉，《宗教哲學》，第43期（2008），頁158–170；吳闓：〈朝天宮的歷史沿革與建築特色〉，收入南京市博物館編：《朝天宮古建築群修繕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10–29。目前正在進展中的項目包括孫亦平：《江蘇道教文化史》，「十二五」國家社科基金重點專案（編號：12AZJ002）。

梳理明代朝天宮建築的變遷，並嘗試解釋這種變遷背後複雜的政治、宗教和社會原因；對揭示朝天宮真實的建築歷史，甚而對朝天宮建築的現代保護工作均將有所助益。

## 一、明代南京朝天宮的建設

朝天宮作為明初都城最重要的官方道觀，在洪武年間得到了大規模的重修。但是在重修和賜名之前，原來道教宮觀的建築已經可以大略負擔駐觀道士的棲居和皇家道教儀式的任務。洪武五年（1372），即有對朝天宮住持宋宗真的任命。<sup>4</sup> 洪武六年正月：「命選朝天宮道士，供天地社稷山川祭祀香幣之事。」<sup>5</sup> 洪武十年，朝天宮道士楊宗玄被選派住持北平萬壽宮。<sup>6</sup> 可知明初朝天宮不僅有道士居住，朝天宮道士還擔任了國家祭祀的重要職責，與此後新創國家祭祀部門神樂觀的道士職能有所重合。洪武十六年，「孝慈皇后小祥，禁在京音樂、屠宰。設齋醮於靈谷寺、朝天宮各三日」。<sup>7</sup> 則朝天宮在重修之前就是京城最為重要的宗教廟宇與皇家宮觀。考《（至正）金陵新志》所收「冶城古跡圖」可知，中線由南至北分別是牌樓、三門、三清殿、法堂、冶亭、飛龍亭。西線為碑亭、子孫堂、藏殿、雲堂、西方丈。再西為卞壺廟、西山道院。東線為鐘樓、火星殿、真武殿、東方丈。再東為倉屋、廚房和女真道院（見圖一）。<sup>8</sup> 在洪武年間朝天宮重修之前，朝天宮建築應基本呈現這種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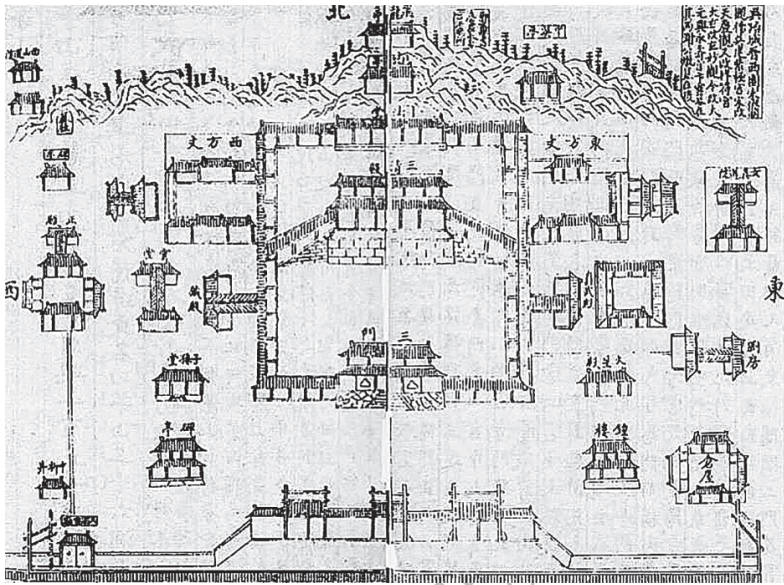
<sup>4</sup> [明]宋濂：〈贈浩然子敘引〉，《文憲集》，卷二十六，《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集部別集類第1224冊，頁380。

<sup>5</sup> 《明太祖實錄》，卷七十八，頁1423。

<sup>6</sup> [明]葛寅亮：《金陵玄觀志》，卷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頁5。

<sup>7</sup>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五十六，頁2424。

<sup>8</sup> 圖片摘自[元]張鉉纂修，李勇先、王會豪、周斌點校：《至正金陵新志》，《宋元珍稀地方誌叢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乙編6至正金陵新志1，頁1577。



圖一 冶城古跡圖

洪武十七年，朝天宮的重建活動開始，「至是重建，賜名朝天宮。設道錄司于內」。<sup>9</sup> 這是明代對南京朝天宮的首次重修，觀名應是此時由永壽宮正式改為朝天宮，開始兼有道教宮觀與全國道教管理機構的雙重身份。但是賜額之後的朝天宮建築，尚不能承載習儀的功能，斷續的重建工作又持續到洪武二十八年。洪武二十八年底，「重建朝天宮成，先是建是宮，凡正旦、聖節、冬至群臣習朝賀禮於其中。上以其制度未備，故命重建之。至是成，詔右演法曹希鳴住持。」曹希鳴(1330-1397)與朝天宮另一位高道劉淵然(1351-1432)均曾從學於元代清微高道趙宜真(?-1382)，<sup>10</sup> 此後分別被授予道錄司要職。明初朝天宮高道多兼有道錄司官員身份，體現了其毋庸置疑的官方道觀地位。此一時期對朝天宮主體建築的重修可以推測主要是對台殿建築的拓建，使其更符合官式建築的格局，以便諸司習儀所需。至

<sup>9</sup>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六十三，頁2523。朝天宮正式得名始於此年，此前所記朝天宮之名應為追述。

<sup>10</sup> [明]張宇初：《趙原陽傳》，《峴泉集》，卷三，《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集部別集類第1236冊，頁447。

此，朝天宮建築的皇家宗教、習儀、官署三大功能都已具備。<sup>11</sup> 洪武二十八年的重修奠定了朝天宮明代建築的基本格局。此後一直到洪武末年，僅在洪武三十年間，為高道劉淵然重修西山道院，以作為劉淵然及其徒眾獨立的住坐之所。

永樂初年，朝天宮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為皇家舉行齋醮儀式。洪武三十五年，太宗命道士「建金籙大醮七晝夜於朝天宮，薦福皇考、皇妣」。<sup>12</sup> 永樂六年七月，「仁孝皇后喪周期，……命禮部於天禧寺、朝天宮設薦揚齋醮」。<sup>13</sup> 同月，又「命靈谷寺、朝天宮建齋醮三日資薦征南亡沒將士」。<sup>14</sup> 永樂十三年（1415），朝天宮再次重建，這是永樂遷都前南京朝天宮的最後一次大型修繕活動。<sup>15</sup> 永樂十八至十九年間，遷都之議成。成祖詔天下將「立兩京，置郊社、宗廟，創建宮室」，<sup>16</sup> 但仁宣年間又有反復。洪熙元年（1425）三月，仁宗尚欲遷都南京，<sup>17</sup> 直到正統六年末，英宗才又定都北京，北京諸衙門始去「行在」二字，而南京諸衙門則增「南京」二字，<sup>18</sup>「南京朝天宮」之名應也始於此前後。《明英宗實錄》言行在工部正統二年曾請修朝天宮，稱為南京朝天宮：「正統二年，行在工部請修南京朝天宮，上以工力繁重不許。」<sup>19</sup> 由此次請修可知，正統初年南京朝天宮已不復舊觀，重修工力繁重也側面證明了其損毀程度。

宣德七年（1432），「命行在工部度地建朝天宮於西直門內」，<sup>20</sup> 北京朝天宮始建。北京朝天宮不僅承擔了原朝天宮百官習儀的功能，也

<sup>11</sup> 《明太祖實錄》，卷二百四十三，頁3535。

<sup>12</sup> 《明太宗實錄》，卷十二下，頁223。

<sup>13</sup> 同上註，卷八十一，頁1077。

<sup>14</sup> 同上註，卷八十一，頁1090。

<sup>15</sup> 同上註，卷一百六十九，頁1882。李顯光論文中有永樂辛丑（1421）都紀徐善淵重建的記錄，似不可信，惜未引出出處，無法核實。參見李顯光：〈南京朝天宮的探索〉，頁158-170。

<sup>16</sup> 《明太宗實錄》，卷二百三十一，頁2235。

<sup>17</sup> 《明仁宗實錄》，卷八，頁272。

<sup>18</sup> 《明英宗實錄》，卷八十五，頁1696。

<sup>19</sup> 同上註，卷三十六，頁0698。若從「抱經樓鈔本」，朝天宮前則無「南京」二字，《明英宗實錄校勘記》（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頁113。

<sup>20</sup> 《明宣宗實錄》，卷九十一，頁2084。

成為中央道錄司所在。<sup>21</sup> 南京朝天宮雖然仍具有相應的功能，但是隨著南都政治地位的整體下降，南京朝天宮的地位逐步降低，在修繕與維護方面屢屢遭挫。「天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昏刻，南方上有火影，下有火腳，是夜南京朝天宮災。」<sup>22</sup> 這次火災對南京朝天宮的主體建築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南京朝天宮一夕燬於火，其不為煨燼者無幾。」<sup>23</sup> 直到成化七年（1471），南京朝天宮的部分宮觀才首次得到復建。這次修復工程浩大，一直持續到成化十二年方完工。商輅（1414–1486）〈奉敕重建朝天宮碑〉中言：「成化庚寅，禮部尚書鄒幹等奏舉道錄司右玄義李靖觀領筭住持，圖惟興建。靖觀等奉行惟謹，因以本宮所積齋糧，并歲收蘆場諸物，變易錢貨，市材鳩工。擇明年辛卯閏九月吉日，告神歲事，而具以實聞。上命南京工部出給黑綠琉璃磚瓦三十餘萬，及木植等料，差撥軍夫、工匠，協助斯役。」<sup>24</sup>〈南京朝天宮重修碑〉記道：「詔道錄司某官臣某往董其役，然後重勞民也，特使勸募為之，一時命下，民庶欣然，咸願相助，富者施財，巧者効技。」<sup>25</sup> 可知這次修繕工作得到帝王、道錄司官員及官民的普遍支持，是較為徹底的修繕。

〈奉敕重建朝天宮碑〉對成化年間重修後朝天宮的建築有詳細的記載：「冶城山頂，有飛龍亭遺址。新建黑綠琉璃兩副簷殿三間，奏改為萬歲殿。山前，前三清寶殿七間，以奉三清聖像。後建大通明寶殿七間，以奉玉皇聖像。前神君殿五間。又前，中山門三間，外山門三間，東西小門二間。門之北，左右經閣二，碑亭二，鐘、鼓各一。東，景德、普濟、顯應三殿；西，寶藏、總制、威靈三殿，殿皆綠琉璃緣邊，通脊吻獸。廊廡八十四間。又東，道錄司、齋堂、神廚、真官堂；西，下公廟、神庫、倉房、土地堂。山後，全真堂。東西方

<sup>21</sup> [明]李賢：《明一統志》，卷一（三秦出版社，1990），頁13。

<sup>22</sup> 《明英宗實錄》，卷三百二十六，頁6734。吳寬《家藏集》補遺〈南京朝天宮重修碑〉記為「成化某年，南京朝天宮一夕燬於火，其不為煨燼者無幾」，應為天順年間誤。見[明]吳寬：《家藏集》，補遺，《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集部第1255冊，頁796–797。

<sup>23</sup> [明]吳寬：《家藏集》，補遺，頁796–797。

<sup>24</sup> [明]商輅：〈奉敕重建朝天宮碑〉，《金陵玄觀志》，卷一，頁15。

<sup>25</sup> [明]吳寬：《家藏集》，補遺，頁796–797。

丈，兩旁弘化、育真二角門，周圍牆垣。宮之前，牌樓二，南扁『朝天宮』，北『蓬萊真境』。是役也，規制悉遵於舊，而輪奐有加於前。」<sup>26</sup> 碑文中雖稱這次修繕「規制悉遵於舊」，但是實際上在建築的格局上發生了多處改變。重建後的朝天宮，轉換了宮門的方向，增建了中山門和神君殿之間的徑道九曲廊和經閣，拓建了萬歲殿等附屬建築，此外，部分宮殿的名稱有所改變，裝飾也更加華麗，「重簷翬飛，巨棟傑特。塗以丹雘，間以金碧。美哉輪奐，有加於昔」。並且，在朝天宮的後山，新創了供朝天宮全真道士修煉的獨立建築全真堂，應為全真堂建築在朝天宮建造之始。

成化年間這次重建後，朝天宮的建築雖然屢有傾頹，但是並未遇到火患等重大災害，朝天宮建築格局基本上穩定地傳至明末。萬曆年間，隨著以葛寅亮(1570–1646)為代表的南禮部官員對南京佛道寺觀的清理，朝天宮的全真堂鉢堂、圓堂和公學得到了建設，這是朝天宮晚明最重要的一次修繕，對朝天宮內各方宗教力量有改寫之力。朝天宮建築中闢有「公學」，這應非之前學者所認為的儒家學堂，<sup>27</sup> 而是道教內部培養人才的場所。南京主要佛教寺院亦設公學，正與葛寅亮重振佛道二教的整體設想相符。這次修繕也伴隨著對朝天宮公產的清理，朝天宮是南京道錄司所統道教宮觀中僅有公產的三所之一，<sup>28</sup> 在成化年間的修繕過程中，朝天宮公產所得便有效地推進了當時的修繕工作。萬曆年間清理公產的條例中並規定了各項出入數目，其中亦包括殿堂修繕的費用，道觀與禮部的官員均清楚地意識到公產對維護朝天宮建築完善的重要作用。<sup>29</sup>

<sup>26</sup> 《金陵玄觀志》，卷一，頁15–16。明末朝天宮亦設有藥王祠，見[明]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十九，類物，《四庫禁毀書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子部第30冊，頁635下。

<sup>27</sup> 吳闈：〈朝天宮的歷史沿革與建築特色〉，南京市博物館編：《朝天宮古建築群修繕報告》，頁15。

<sup>28</sup> 另外兩所直至晚明依然保有公產的宮觀分別是石城山靈應觀和園林庵。參見《金陵玄觀志》，卷二，頁42；卷十一，頁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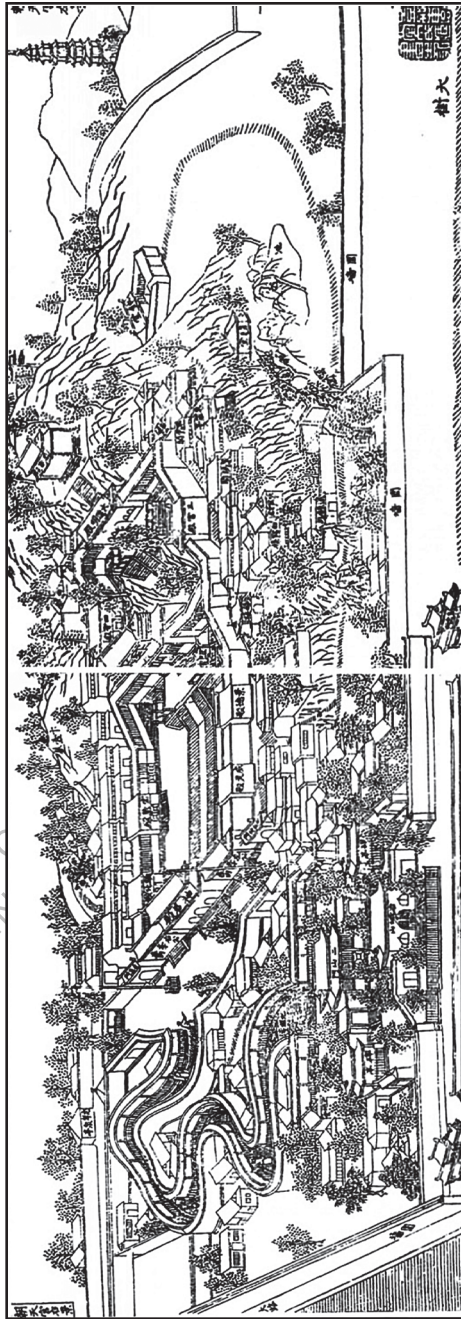
<sup>29</sup> 《金陵玄觀志》，卷一，頁38。

在萬曆年間的佛道寺觀整改工作基本結束之後，禮部祠祭司官員葛寅亮將整理的過程彙集為《金陵玄觀志》和《金陵梵刹志》二書。玄觀志編成後，板存朝天宮。在書首附有明代南京畫師凌大德所繪朝天宮左右景圖，詳細地描繪了萬曆三十六年(1608)葛寅亮清整寺觀後朝天宮建築的總體情況(見圖二)。對比成化年間商輅的記載，萬曆中後期朝天宮的格局基本保持穩定，但殿宇的名稱和功能稍有差異。中路從南至北，「蓬萊仙境」牌樓為「表忠坊」所取代，南設「朝天街」牌坊一座。增設公學位於神君殿左右廊房，三清殿西側從南至北為顯化、寶藏、四聖(四聖殿應即總制殿的別稱)三殿，東側為威靈、景德、三官(三官殿應即普濟殿的別稱)三殿，與成化重修後的記錄相比，威靈殿的位置從西側移到了東側，顯應殿不僅位置變化，而且殿名也變為顯化。朝天宮左右景圖還為補充朝天宮東路建築提供了信息：在道錄司之北的冶城山東麓，密集地建有白鶴樓、火星殿、景陽閣、東麓亭、飛霞閣、東山道院等建築。在朝天宮後山，則有曲徑連接新修的全真鉢堂與圓堂。從該圖的細節來看，萬曆晚期的朝天宮建築比之成化年間的繁盛境況不遑多讓。同時，隨著朝天宮宗教空間進一步向公眾開放，朝天宮景觀建築開始得到重視和記錄。景陽閣、飛霞閣等成為晚明文人登臨、賞玩、宴飲的重要場所，「俯眺都內，一覽無遺」，<sup>30</sup>朝天宮景觀意義的上升，正可與朝天宮左右景圖將遠景鐵塔倉塔納入畫面，以「借景」凸顯冶城山景觀意味的做法相互印證。這種強調朝天宮建築景觀意義的做法，也可從稍後朱之蕃(1558-1624)等所編《金陵圖詠》「冶麓幽棲」中看出(見圖三)，山門與神君殿之間極富特色的九曲廊被戲劇化地呈現，鐵塔寺塔與永慶寺塔雙雙進入朝天宮遠景的範圍，朝天宮建築由此同時具備了景觀與觀景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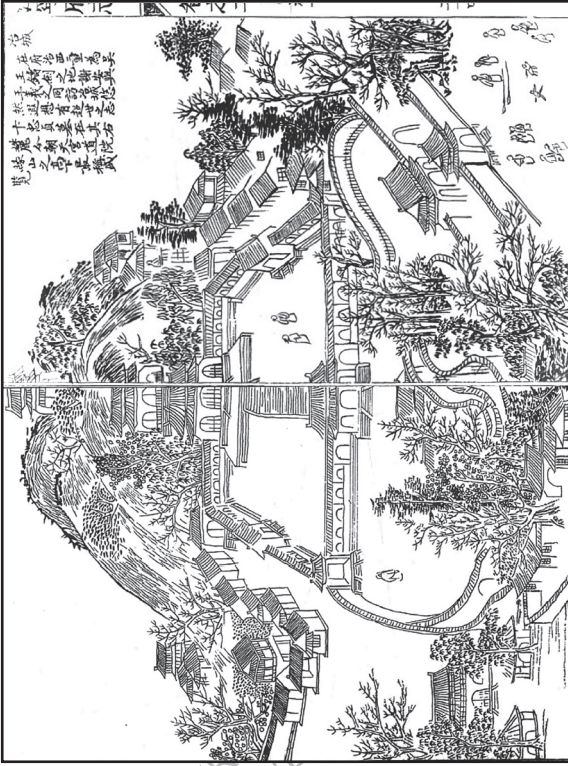
<sup>30</sup> 《金陵玄觀志》，卷一，頁1。

<sup>31</sup> 圖片摘自《金陵玄觀志》，不標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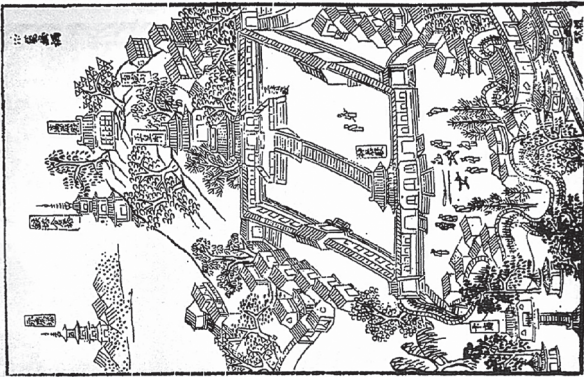




圖二 朝天宮左右景圖<sup>31</sup>



圖四 治城圖<sup>33</sup>



圖三 治麓幽棲<sup>32</sup>

COPYRIGHT BY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明代南京朝天宮的最後一次重修發生在崇禎年間，《(康熙)上元縣志》載：「崇禎戊寅年，南京刑部尚書安甄淑重修，有《記》。」<sup>34</sup> 安甄淑應為甄淑之誤。甄淑(1583–1642)，字爾儀，號錦石，湖廣黃州府黃岡縣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崇禎十二年(1639)任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下獄，次年死於獄中。<sup>35</sup> 與縣志所載朝天宮重修的時間崇禎十一年接近，可惜重修的記文不存，無法查知當時重修的具體狀況。但以甄淑崇禎十三年下獄的情況來看，修繕的時間恐較為短暫。康熙六年(1667)所編成《江寧府志》中朝天宮圖像是目前能看到的清代最早的朝天宮全景圖，該圖收入府志，可能較為真實地呈現了朝天宮的景觀。圖像的佈局雖明顯地借鑒了《金陵圖詠》中的「治麓幽棲」，但從其中描繪的朝天宮建築細節來看(見圖四)，若崇禎年間甄淑的重修屬實，則這次重修至少較好地維持了朝天宮的主體建築，特別是道觀建築主軸的面貌。

## 二、朝天宮建築格局的特點

朝天宮的修建雖然始於洪武年間，但洪武年間的修建主要是為了滿足皇家齋醮儀式和百官習儀的需要，故修繕的重點在拓展主軸三大殿及其兩側的宗教建築，使之具備祭祀多種神靈的條件，同時更加符合三殿制習儀場所的需要。朝天宮的主軸是一組典型的道教建築，也是傳承最穩定的建築群。其中心是三清殿(七楹)，承前代祭祀道教上清、太清、玉清三神。三清神曾出現在明太祖充滿道境的夢中，並疑天神

<sup>32</sup> 圖片摘自[明]朱之蕃：《金陵圖詠一卷附金陵古今圖攷一卷雅遊編一卷》(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天啟間刻本)，頁39。

<sup>33</sup> [清]陳開虞：《江寧府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金陵全書甲編，方志類，府志，康熙江寧府志1，頁274–275。

<sup>34</sup> [清]武念祖：《(道光)上元縣志》，卷十四，《中國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江蘇府縣志集，頁236。錯為安甄淑可能是甄淑常署名「齊安甄淑」，縣志編纂者將地名取為姓造成。參見[明]甄淑：〈天全翁傳〉，[清]穆守之：《江都卞氏族譜》(日本國會圖書館藏道光十年金陵穆守之刊本)，第13冊，頁31。

<sup>35</sup> 《明崇禎實錄》，卷十二(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頁357。

來自於朝天宮，<sup>36</sup> 這一夢境被認為是君權神授和天下大治之兆。<sup>37</sup> 三清殿之北是大通明寶殿（七楹），俗稱「玉皇殿」，祭祀玉皇上帝，此殿在明代以前規模較小，很可能是玉皇信仰深受帝王偏愛的成化年間拓建。<sup>38</sup> 三清殿之南是神君殿（五楹），祀道教神君，這一位置傳統上有守衛殿閣的作用。三清殿東西兩側明代之前即有的東西方丈，是朝天宮住持和道錄司高道住坐的重要場所，應也得到了妥善的修護。

三清正殿兩旁的配殿在洪武年間可能亦已修建。對比北京朝天宮普濟、景德、總制、寶藏、佑聖、靖應、崇真、文昌、玄應九殿的設置來看，普濟、景德、總制、寶藏四殿南北相同，供奉的應是相似的神靈，地位較為重要。普濟殿應祀天、地、水三官，總制殿應祀天蓬、天猷、翊聖、佑聖四聖，故在凌大德所繪朝天宮左右景圖中又稱「三官殿」和「四聖殿」，景德、寶藏二殿所祀神靈不可考。另有威靈、顯應（顯化）二殿，威靈殿供奉的有可能是王靈官，也有研究認為是應天府城隍。<sup>39</sup> 參考北京朝天宮的神靈設置，顯應殿則有可能供奉文昌。<sup>40</sup>

成化年間對朝天宮的修復工程浩大，不僅需要重建被火焚毀的道觀神殿和東西方丈，還增修了冶城山的相關附屬建築。冶城山山頂，有飛龍亭遺址，成化年間重修時，因相傳太祖曾親臨，奏改「萬歲殿」，並且將原本的亭拓展為檐殿三楹，使冶城山頂的建築由亭變為殿閣。在山門官將殿北，為度藏成化十二年英宗所賜道藏，<sup>41</sup> 兩側分別修立經閣。兩側碑亭應亦為成化年間增建，南碑即商輅所撰「奉敕重建朝天宮碑」。但相對於殿閣的重修，朝天宮建築結構上最重要的變化，是將朝天宮的山門和牌樓扭轉了方向，在中山門與神君殿之間增建九曲廊，並且按照風水學的原理增建了象徵性的亭等建築，<sup>42</sup> 九

<sup>36</sup> [明]明太祖：《紀夢》，《全明文》，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177-179。

<sup>37</sup> 《明太祖實錄》，卷三十，頁526。

<sup>38</sup> 《明憲宗實錄》，卷一百五十六，頁2849。

<sup>39</sup> 《朝天宮古建築群修繕報告》，頁13。威靈、顯應二殿所祀神靈的討論參考匿名評審人的意見，特此致謝。

<sup>40</sup>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頁185。

<sup>41</sup> 《護道藏敕》，《金陵玄觀志》，卷一，頁7-8。

<sup>42</sup> 「四隅以四亭翼之」的建築特點是否在風水之外，還兼有禮制上的因素，有待進一步探討。

曲廊與四亭形似玄武，因此有禳火的傳說：「冶城，……國朝為朝天宮。初，門向南，後以宮內火災，移門居東巽方，而徑為九曲，前小殿，四隅以四亭翼之，象玄武禳火也。」<sup>43</sup> 這種以「風水」為名的考量使得朝天宮的建築形式別具特色，九曲廊在晚明成為文人遊賞的景觀之一。

在冶城山西側，另有忠貞公卞壺祠墓，「掌於宮之道士」，<sup>44</sup> 洪武年間即有重修卞壺墓的傳說，但明代卞忠貞公祠真正的重修活動應是在成化年間。由南京吏部左侍郎錢溥（1408–1488）倡議，負責重修朝天宮的道錄司右玄義李靖觀、朝天宮住持戴詠舟承辦。「拓其墓，新其祠，以妥其靈。」<sup>45</sup> 李靖觀利用成化七年至十二年間整修朝天宮主體建築剩餘的材料，重構前廳、中堂、後寢，再加彩繪，並塑卞公與裴夫人像於內，卞壺墓也得到了整修。重修卞壺祠墓的工程在成化十四年完成，<sup>46</sup> 重修後的卞壺祠墓後被納入成化七年開始的朝天宮建築整體修繕工程之內，在成化十五年所撰〈奉敕重修朝天宮碑〉中，「卞公廟」赫然在列。這次重修使得南京的下壺祠祭場所由明初敕建的欽天山歷代忠臣廟轉移到朝天宮，下壺春秋二祀成為朝天宮道士的重要祭祀活動之一。卞壺祠此後一直由朝天宮道士負責管理和祭祀，正德年間在朝天宮道士的支持下又經歷了重修。<sup>47</sup> 直至嘉靖中後期，江都卞氏族人開始通過奉祀和修繕卞壺祠參與到下壺祠墓管理的工作中來。嘉靖到崇禎年間，江都卞氏在揚州和南京的兩支積極地參與了卞壺祠墓的重修，並因此爭取到下壺嫡系的身份。地方宗族建設的需求開始影響到朝天宮建築的發展。但直到崇禎年間，卞壺祠的祭祀均是由朝天宮道士直接參與，先賢後裔與道士之間達成了默契，共同致力於卞壺祠墓的建設和祭祀活動。這種平衡直到清初才因卞氏家族內部的競爭而被打破。<sup>48</sup>

<sup>43</sup> [明]顧起元：〈冶城〉，《客座贅語》，卷十（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318。

<sup>44</sup> [明]喬宇：〈遊冶城山記〉，《金陵玄觀志》，卷一，頁18。

<sup>45</sup> [明]倪岳：〈書重修卞忠貞公廟碑陰〉，《青溪漫稿》，卷二十一，《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集部別集類第1251冊，頁275。

<sup>46</sup> [明]姚祚端：〈重修晉忠貞公雙祠廟墓記〉，《江都卞氏族譜》，第3冊，頁8–9。

<sup>47</sup> [明]楊廉：〈卞廟重修記〉，《江都卞氏族譜》，第2冊，頁41。

<sup>48</sup> [民國]〈奉祀執照〉，《勝西卞氏續修族譜》（天津圖書館藏本），第1冊，頁9。另參賀晏然：〈道觀與家祠——明代卞忠貞公的雙祠記〉，《宗教哲學》，第88期（2019），頁1–14。

葛寅亮萬曆年間所編《金陵玄觀志》為晚明朝天宮建築留下了一份最為詳盡的記錄，與成化年間商輅對朝天宮建築的記錄相對照，可知朝天宮建築發展變化的過程。成化年重修之後，朝天宮主體建築前有牌樓二，分別為「朝天宮」，與「蓬萊仙境」，凌大德所繪圖中，標示為「表忠坊」與「朝天街」，實為萬曆二年祭祀建文死節諸臣的表忠祠在朝天宮以東建立時所設。<sup>49</sup> 在神君殿兩側，葛寅亮增設了左右公學，作為朝天宮道童和道士學習道教知識的場所。這雖沒有改變朝天宮建築的外觀，但是反映了禮部官員朝對天宮道士宗教素養的憂慮。成化到萬曆年間，朝天宮東側山麓的景觀建築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文人登高吟詠的詩詞開始大量出現。而同處東面的道錄司建築則受到了忽視，規模進一步壓縮。葛寅亮任職南禮部祠祭司期間，在冶城山後山完成了對全真鍊堂和圜堂的重建工作，在禮部官員主持下的行政設計一度改寫了晚明朝天宮建築的格局。在葛寅亮《金陵玄觀志》的記錄中，朝天宮除了殿堂部分，還有三個相對獨立的機構，分別是西山道院、全真堂和道錄司，對此三處建築明代的修建和維護情況，下文將分別予以敘述。

### (a) 西山道院

西山道院相傳建立於宋代。《(至正)金陵新志》載：「西山道[院]在冶城山之西麓黃泥巷。宋嘉定中，默應居士張守正者，遇一道人云來自西山，授以驅蝗法，有應。守正結草菴以居。嘉熙中，其從子妙真因建為西山僊集道院，祠許真君云。」<sup>50</sup> 並在所附冶城圖中標示。《南都察院志》亦載：「西山道院，在冶城山西朝天宮內。宋嘉平中，張守正遇一道人，授以驅蝗法，守正結草庵，名西山道院。」<sup>51</sup> 可知西山道院在明代以前即有其名，其所祀許真君或許暗示了道院的宗教傳

<sup>49</sup> [明]李廷機：《李文節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史部第44冊，頁694。

<sup>50</sup> [元]張鉉纂修，李勇先、王會豪、周斌點校：《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一上，《宋元珍稀地方誌叢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乙編6至正金陵新志3，頁1288。

<sup>51</sup> [明]施沛：《南都察院志》，卷二十一，職掌十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1），第73冊，頁603。

統，但是這與西山道院劉淵然弟子等後來所稱「淨明嗣派」之間很可能存在差異。方志中提及的西山道院地在冶城山之西，與明代西山道院的位置相仿，故《護西山道院敕》所謂「南京西山道院，乃洪武中建」，很可能是對原西山道院的重修。

重修後的西山道院一般認為是明初高道劉淵然的住所，但劉淵然初至南都時，不僅西山道院尚未重建，朝天宮的整體重修工作也未完成。<sup>52</sup>《明太祖實錄》載洪武二十六年，「召道士劉淵然於贛州，賜號高道，館於朝天宮」。<sup>53</sup> 洪武二十八年底，重建朝天宮的工作方完成。為了方便劉淵然的住坐，洪武三十年重修了朝天宮西山道院。《護西山道院敕》中引喻道純所奏道：「洪武三十年春，重修本宮已完。又命官重建西山道院，與臣師祖劉淵然安居。」<sup>54</sup> 可知二十八年重修朝天宮主體建築時，並未重修西山道院，而以劉淵然居住為緣起的洪武年間的重修，為此後西山道院以劉淵然徒眾為核心的獨立地位奠定了基礎。重建後的西山道院，有屋數十楹，<sup>55</sup> 其規模是整個明代最為宏大的時期。西山道院建成後，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初一，明太祖駕幸朝天宮，至西山道院。第二日，劉淵然便離開西山道院奉敕出遊尋真。行至胡廣驛被召回，此後直到永樂三年升左正一，多在西山道院居住。但是升任後不久，劉淵然便被謫居龍虎山，尋徙滇南。故劉淵然居住在西山道院的時間並不長，主要從洪武末年至永樂初年，以及宣德七年間再次回到西山道院居住的六個月。

宣德以來，是劉淵然一派在南北兩京宗教力量逐漸增加的階段。劉淵然在北京洞陽觀居住期間，其徒邵以正被薦於朝，邵以正後來成為劉淵然弟子中地位最高的道官之一。<sup>56</sup> 宣德七年二月，宣宗親作《山

<sup>52</sup> 關於劉淵然的研究，參見郭武：〈趙宜真、劉淵然與明清淨明道〉，《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2011），頁77-86；Richard G. Wang, "Liu Yuanran and Daoist Lineages in the Ming,"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7 (2015), 265-335；許蔚：〈趙宜真傳記中的捨棄資料〉，《輔仁宗教研究》，第37期（2018），頁91-118。

<sup>53</sup> 《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三十，第3364頁。《護西山道院敕》記為「洪武二十五年」（《金陵玄觀志》，頁8），應以《實錄》為準。

<sup>54</sup> 《金陵玄觀志》，卷一，頁8。

<sup>55</sup> [明]楊榮：〈長春劉真人傳略〉，《金陵玄觀志》，卷一，頁22。

<sup>56</sup> 馮千山：〈邵以正生平、《道藏》及其他〉，《宗教學研究》，第1期（1992），頁46-52；黃吉宏：〈趙原陽、劉淵然道脈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

水圖》並遣太監羅智陪護劉淵然回南京朝天宮西山道院養老。同年八月初八，劉淵然坐化。其道孫南京道錄司左玄義李明善主持了劉淵然的喪事。<sup>57</sup> 這次劉淵然在西山道院的居住雖然僅持續了六個月，但是對南京道教的影響亦大。劉淵然在南北兩京的弟子圍繞其祭祀在朝天宮內外進行了大量宗教建設。<sup>58</sup> 隨劉淵然南來的羅智(1375-1448)此後也成為南京宗教事業的積極支持者，羅智在宣德、正統間任南京守備太監，並於宣德七年在南京石城山修建道觀王靈官祠，王靈官祠此後發展為石城山靈應觀，成為南京道錄司轄下僅次於朝天宮的重要宮觀。靈應觀的住持不僅長期從朝天宮道士中選派，靈應觀同時還獲得了朝天宮宮產、即南京城西最重要的湖泊之一烏龍潭的所有權。這一系列操作與劉淵然回歸西山道院，重振其在南京朝天宮的法派有重要關係。

西山道院遭遇的最嚴重的災患也即宣德五年三月，摧毀幾乎整個朝天宮主體建築的火災。西山道院隨即由本院道士徐永謙捐資修繕。「本院道士」之稱對理解西山道院和朝天宮的關係意義重大，西山道院的道士雖然未必在道法上與朝天宮道士相區隔，但是在朝天宮各房關係上，西山道院道士很顯然已形成相對獨立的道派傳承，本院道士對西山道院的災後重修負有獨立的責任，因此在成化十五年官方主導的對朝天宮的重修工作中，並沒有提及對西山道院的重建。<sup>59</sup>《護西山道院敕》詳細記載了徐永謙重修西山道院的過程：「有本院道士徐永謙，自行發心緣，並備已資，置買木植、磚瓦等料，仍於基址照舊造道院，看守居住。」從徐永謙建造道院和被授予職位的過程來看，他很可能也是西山道院資產的管理者和道院實際工作的負責者，這次重修工作並沒有繼續拓展西山道院的規模，而是以恢復道院的原始建築為宗旨。

西山道院的重建工作雖在天順年間，但是針對這次修繕工作的《護西山道院敕》實際上頒布於成化十三年。更有意思的是，敕文的頒布隱含了朝天宮道士和西山道院道士之間微妙的競爭關係。劉淵然的

<sup>57</sup> 岳涌等：〈南京西善橋明代長春真人劉淵然墓〉，《文物》，第3期(2012)，頁22-30。

<sup>58</sup> 賀晏然：〈明代南京「棲真觀」與劉真人祠堂考辨〉，《道教學刊》(待刊)。

<sup>59</sup> [明]商輅：〈奉敕重建朝天宮碑〉，《金陵玄觀志》，卷一，頁15-16。



徒孫喻道純是支持西山道院重修的中央道官，同時他也是道錄司高道邵以正最重要的弟子之一，成化十年喻道純已經獲得了「普濟真人」的封號。在求取護院敕文的過程中，喻道純道：「伏望聖恩憐憫，念臣師祖劉淵然荷蒙太祖高皇帝蓋造道院，累朝恩典，乞護勅永鎮道院，不許閒人打攪。乞將道士徐永謙量授一職，俾祝聖壽，以圖補報永遠。徒眾焚修看守，供奉宣宗章皇帝恩賜御筆《山水圖》，并神明香火，實為便益。如蒙俞允，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sup>60</sup> 憲宗接受喻道純的請求，給予重修西山道院的徐永謙南京道錄司右玄義一職，這種本授予道錄司官員的職位，不僅確保了西山道院的子弟具有了與朝天宮道官相同的政治地位，也進一步確立了西山道院道眾與朝天宮道士在宗教關係，包括建築關係上的平等性。

西山道院的建築在格局上也印證了這種獨立性。其中標誌性的建築是歷代真人祠堂，真人祠可能是明初供奉朝天宮歷代高道的公共建築，但劉淵然逝後的入駐使得歷代真人祠逐漸成為劉淵然一派的私產，<sup>61</sup> 萬曆年間這一建築已歸屬西山道院名下，供奉的應是劉淵然一派獲得真人頭銜的高道。院內的江東祠所供應為宣德七年宣宗欽賜劉淵然的《山水圖》，因題畫詩中有「旦來謝別何匆匆，騎鶴逕度江之東」之句而得名。這些建築都是西山道院道士維護正統的有力證明。此外，還有東西兩側廂房二十楹，正廳、中廳、後廳各三楹，與西山道院始建時的規模相當。<sup>62</sup> 西山道院是劉淵然道派依靠道官力量在明代南京朝天宮內傳承的明證，雖然劉淵然道派正德以後在南都逐漸衰頹，但西山道院建築直至萬曆年間的妥善保存體現了明初高道深遠的宗教政治影響力。

## (b) 全真堂

朝天宮全真堂是專為全真道士建造的獨立修煉和生活空間，全真堂的興廢過程體現了官方道觀中道派發展的特點。雖然有的研究認為全真

<sup>60</sup> 《金陵玄觀志》，卷一，頁9。

<sup>61</sup> 陳璉：〈長春劉真人祠堂記〉，《琴軒集》，卷十五（東莞歷代著作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2冊，頁756-758。

<sup>62</sup> 西山道院內另有碑亭一座，所奉不知何碑，存疑。

堂的建設始於洪武年間，<sup>63</sup> 甚至與元代全真庵之間有密切的傳續關係。<sup>64</sup> 但是目前的史料較為明確地顯示成化年間全真堂方在朝天宮內首次修成。記錄成化年間朝天宮重建過程的〈奉敕重建朝天宮碑〉中記載：「山後，全真堂。」<sup>65</sup> 萬曆年間記錄全真堂重修過程的〈朝天宮重修全真堂記〉也將其始建的年份追溯到成化十五年：「宮內舊有全真堂，在山之陰。成化己亥修葺，商文毅公〈記〉內可考。」<sup>66</sup> 全真堂首次建設的過程與明初朝天宮正一、全真勢力的消長，以及國初全真高道，特別是成化年間傳奇道士尹蓬頭的活躍的社會活動有關。<sup>67</sup> 但是其反映的宗教關係依然是洪武年間重整釋道二教時，對道士正一、全真兩種身份的設計。<sup>68</sup>

全真堂建立之初，就在位置上與朝天宮的主體建築相區隔。其地在朝天宮後山，並且有獨立的圍牆和角門出入。從全真堂設置的位置和建築結構看，其管理者在身份上也與朝天宮傳統道士群體互不干涉。體現了全真堂寓於朝天宮主體建築之中而相對獨立的特殊身份。但是全真堂建立之後，很可能隨著正德初年，尹蓬頭等全真道士活動的結束而衰落。到了萬曆年間，全真堂建築已經湮滅無聞。但是全真道士在朝天宮內的活動依然隱秘地持續著。如葛寅亮任職祠祭司期間，就記錄了全真道士趙教常在朝天宮內的修煉活動：「全真之學，近有趙教常其人，實先斯堂三年，結茆閒地，四面甃壁，止開隙牖通飲食。客至，稍稍問答無多語，藉非心無所持。即飲食亦且為四體病，其何能枯坐且三年哉？姑無論教常能尹，謂教常而非清淨之業也耶？」<sup>69</sup> 可知全真道士在朝天宮內的活動雖然備受壓制，但是以獨特的修煉方式與朝天宮的正一道士產生差別，引起了晚明文人，尤其是致力於恢復明初道教秩序的儒家官員的重視和青睞。

<sup>63</sup> 張方：《明代全真道的衰而復興——以華北地區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頁27。

<sup>64</sup> 劉康樂：〈沉寂中的潛流：明代江南地區全真教的傳播〉，收入熊鐵基等編：《第二屆全真道與老莊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上冊，頁440-454。

<sup>65</sup> [明]商輅：〈奉敕重建朝天宮碑〉，頁16。

<sup>66</sup> [明]葛寅亮：〈朝天宮重修全真堂記〉，《金陵玄觀志》，卷一，頁17。

<sup>67</sup> 賀晏然：〈明代南京全真道士尹蓬頭考〉，《全真道研究》（待刊）。

<sup>68</sup> 《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九，頁3109。

<sup>69</sup> 《金陵玄觀志》，卷一，頁18。

萬曆三十五年前後朝天宮全真堂的復建是明代全真堂最為重要的一次建設活動。主持重建的禮部祠祭司官員葛寅亮以朝天宮為南京道教改革的模板，參考佛教禪堂的形式，為復建的全真堂建立了完備的建築體系，包括「大門參楹，壹楹作門，左右作住房。正殿參楹。左右靜室陸楹。廚庫等房肆楹。」<sup>70</sup> 從全真堂的建築格局可知全真堂不僅具備道士靜修的功能，同時有自己獨立的廚房和倉庫，在管理上具有極大的自主性。不僅如此，全真堂還有相對獨立的管理方法和田產。葛寅亮將原屬朝天宮的七總莊田地二百六十九畝五分，房地二十五間直接撥到全真堂名下，作為全真堂額定的十四名道士的生活費用。<sup>71</sup> 葛寅亮等禮部官員的初衷雖然是為了改革朝天宮日漸奢靡和世俗化的道教風氣，但其僅憑一己之力力圖扭轉朝天宮長久以來的宗教和經濟結構顯然難以如願。葛寅亮的改革受到了多方勢力的阻撓，不久去職。全真堂也很快再次陷入了衰落。

大約在崇禎初年，全真堂已經搬出朝天宮，而遷往數里之外的清涼山畔。居住在搬遷後的全真堂附近的文人卓發之（1587-1638）為全真鉢堂撰寫了〈鉢堂修街募疏〉和〈全真道院募田疏〉。〈鉢堂修街募疏〉中記道：「（全真鉢堂）向在冶城，今移創虎踞關畔，雖尚在都城，而彷彿洲島，平巒曲阜綿亘十餘里。」<sup>72</sup> 可知全真鉢堂即原朝天宮內全真堂。並且，全真堂的搬遷並未攜帶原有宮產，其處境艱難，不僅地處偏僻需要修整進入鉢堂的道路，同時無力供養道眾，需要重新籌集田產。但是〈全真道院募田疏〉中明確記載，朝天宮全真堂的宗教傳統由搬遷後的全真鉢堂白雲煉師妥善地繼承下來，並且發展出對明初全真高道的祭祀傳統。<sup>73</sup> 這種繼承幫助南京的全真道在強大的官道政治勢力的夾縫中保留了傳承的種子，對南京清代全真道觀的復興意義重大。

由此可見，明代朝天宮全真教建築的興衰是複雜的政治力量與教派力量互動的結果。全真堂建築始終相對獨立於朝天宮前山的宗教建

<sup>70</sup> 《金陵玄觀志》，卷一，頁2。

<sup>71</sup> 同上註，卷一，頁17。

<sup>72</sup> [明]卓發之：〈鉢堂修街募疏〉，《漉籬集》，卷十四疏，《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107冊，頁542；〈全真道院募田疏〉，《漉籬集》，卷十四疏，頁545-546。

<sup>73</sup> 賀晏然：〈明代南京朝天宮全真堂的興衰〉，《宗教學研究》（待刊）。

築，並且其存在的時間短暫而斷續。可以查知的全真堂建築的相關記錄僅從成化十二年到約正德初年，以及萬曆三十五年前後到萬曆末年。由於受到在地官員和朝天宮道眾的排擠，葛寅亮的宗教設計真正實施的程度存疑。<sup>74</sup> 萬曆年間的重建，可以說是明代全真堂建築規模最為完備的一次建設，其主體建築達到了與當時南都道教管理機構道錄司相同的規模。相較於成化年間的首創，對全真堂附屬生活建築的完善，說明了全真道士不僅在宗教上，進而在道教生活中與朝天宮傳統道教勢力的差異。

### (c) 道錄司

明初道錄司設立的時間稍早於道錄司建築在朝天宮內修築的時間，洪武十四到十五年間，革明初所設玄教院，禮部獲准新設僧道衙門，將僧道管理正式納入國家官僚體系之中，設在京城中央道教衙門稱道錄司。<sup>75</sup> 洪武十七年，朝天宮洪武年間第一次重建工作包括「設道錄司於內」。<sup>76</sup> 道錄司道官才獲得了穩定的官署。道錄司在朝天宮的駐紮決定了朝天宮官方道觀的性質。明初的道錄司官員主要由以龍虎山為核心的正一道士擔任，中央道錄司隸屬於禮部祠祭司，明初額設道官八名，分別是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靈和左右玄義。<sup>77</sup>

但是隨著永樂以來南京道錄司地位的持續下降，北京朝天宮開始在宗教事務管理中發揮主導作用。南京道錄司官員也從原定的八名，減少為額定左右玄義各一員。<sup>78</sup> 不僅如此，道錄司官員的職銜也常常被授予朝天宮不同機構的道士。如前文所述宣德年間，劉淵然道孫李明善就擔任了南京道錄司左玄義。成化十三年間，曾幫助重修西山道院的道士徐永謙也被請旨授予南京道錄司右玄義之職。劉淵然徒孫，

<sup>74</sup> [明]顧起元撰：〈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贈禮部尚書蘭峯朱公墓誌銘〉，《雪堂隨筆》，卷三，《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8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80冊，頁275。

<sup>75</sup> 何孝榮：〈《明史·僧、道錄司》辨誤四則〉，《清華大學學報》，第6期（2006），頁108。

<sup>76</sup>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六十三，頁2523。

<sup>77</sup> 同上註，卷一百四十四，頁2262。

<sup>78</sup> 《金陵玄觀志》，卷一，頁39。

幫助籌建長春劉真人祠堂的李希祖也曾擔任道錄司玄義。<sup>79</sup> 劉淵然弟子的職位雖有可能類似賜予名山道士的虛職，但其在朝天宮中的地位和兼任住持的道官相當，類似的職位授予可能在西山道院和朝天宮道士系統中持續存在了一段時間，請賜道官成為朝天宮內各方勢力爭取宗教和政治資源的手段。但是這種授職模式，很可能瓜分了道錄司的權力，玄義各自在西山道院與朝天宮住坐，從而降低道錄司在道教事務中整體權力的有效性。這必然也會影響到道錄司建築在朝天宮內的實際功能和地位。

天順五年火災之後，道錄司於成化七年的整體重修中得到了修復。〈奉敕重建朝天宮碑〉記錄道：「又東，道錄司、齋堂、神廚、真官堂」。<sup>80</sup> 道錄司與齋堂、神廚相鄰，在朝天宮內的位置並不顯著。在葛寅亮任職道錄司之前，道錄司建築已經難以為繼。《金陵玄觀志》中所載道錄司「左側基地伍楹，門前基地柒楹」應即道錄司萬曆年之前的規模。縱使這一規模，對於全國性的道教官署來說，顯然是較為簡陋的。與朝天宮內其他機構，如西山道院和全真堂相比也較為狹小的。實際上，道錄司在禮部祠祭司的管轄下，本身職權不重。明中葉以來，隨著禮部對度牒考試和道官考試權力的回收，道錄司官員對道士和道教事務管理的權力逐漸下降。<sup>81</sup> 萬曆年間湯顯祖在〈朝天宮〉詩中就曾感歎：「教門公事亦無多」，<sup>82</sup> 這些都導致了道錄司建築地位的持續下降。

此外，道錄司的經濟狀況也較為艱難。晚明南京道錄司和佛教僧錄司的管理方式差異巨大。南京僧錄司所入主要來自上元、江寧二縣諸山銀及溧陽、高淳、句容、江浦、六合、溧水六縣僧會司所納，所出、進項單獨結算，受到所駐佛寺經濟狀況的影響較小。南京道錄司卻沒有單獨的進項，完全依賴朝天宮的經濟收入，且六縣道會司並無

<sup>79</sup> [明]王直：〈長春劉真人祠堂記〉，《抑菴文後集》，卷五，《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集部，別集類，第1241冊，頁427-428。

<sup>80</sup> 《金陵玄觀志》，卷一，頁16。

<sup>81</sup> 賀晏然：〈官僚、科舉與道派：明代道官考選制度的建立與發展〉，《江蘇社會科學》，第5期（2018），頁235-245。

<sup>82</sup> [明]湯顯祖，徐朔方校：〈朝天宮〉，《湯顯祖全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詩集，卷十八，七言絕句，第1冊，頁407。

上納。<sup>83</sup> 道錄司所出由朝天宮一力承擔的狀況無疑限制了道錄司管理的獨立性，而加強了朝天宮道士與道錄司官員之間的聯繫，在晚明建立了一條從朝天宮牒道→通經道士→大住持→右玄義 / 左玄義的穩定但封閉的晉升道路。<sup>84</sup> 這一晉升道路使得道錄司完全淪為朝天宮的私產，而在對南京宮觀的管轄力度上，雖有萬曆年間葛寅亮等寺觀分層管控政策的提議，但是隨著葛氏改革的迅速失敗，其施行的時間可能極為短暫。<sup>85</sup>

道錄司在成化重修到萬曆年間葛寅亮任職之間，於嘉靖初年又經歷了完全的損毀。「舊司歲久傾頹，止存基地。舊有拖租，道士徐用和追出道房，改作道錄司衙門。」<sup>86</sup> 可知道錄司的維持與道錄司建築的經濟情況有關，但從朝天宮道士用道房改作衙門的方式也不難看出道錄司衙門的不穩定性。由道房改造的道錄司建築包括大門三楹、正廳三楹，實際上能夠作為辦公之所的只有正廳，實為狹小。萬曆年間，由於道錄司建築傾頹嚴重，又短暫設置於全真堂內，因此造成全真堂道眾的不滿。萬曆末年，在禮部官員徐如珂（1562–1626）的主持下，由全真堂、鄉紳和朝天宮共同出資，在舊址上有所拓建。拓建後的道錄司建築「為堂三楹，為門三楹，為旁舍有六」，<sup>87</sup> 是次重建應該是道錄司建築明代的最後一次重建，較之葛寅亮時期拓展有限。從《金陵玄觀志》所附凌大德朝天宮左右景圖也可以看出，道錄司偏居冶城山東麓的邊緣，與通往後山的角門最為接近，門內僅有道房一間，此雖非附於全真堂的道錄司，但其規模也暗示了明末南京道錄司有限的功能和地位。

<sup>83</sup> [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五十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頁819。這很可能與南京道教宮觀的艱難處境有關。相較於南京及其周邊的佛寺，道觀的經濟狀況顯然差得多。

<sup>84</sup> 《金陵玄觀志》，卷一，頁41。

<sup>85</sup> 何孝榮：〈論萬曆年間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成大歷史學報》，總第40號（2011），頁61–92。

<sup>86</sup> 《金陵玄觀志》，卷一，頁2。

<sup>87</sup> [明]徐如珂：〈朝天宮復全真堂碑〉、〈朝天宮重建道錄司碑〉，《徐念陽公集》，卷四（清道光二十八年袁江節署之求是齋刻乾坤正氣集本），頁12–13。

### 三、朝天宮與明代南京道教

明代朝天宮建築格局的變動，主要體現了以西山道院、朝天宮和全真堂為代表的朝天宮道士角力的過程。其中牽涉的既有制度意義上的正一、全真之分，也有道教生活中的道士法派的分歧。相較而言，朝天宮主軸道教建築與西山道院是朝天宮建築群中最為穩定的部分，其發展主要仰賴道官與朝廷的協力，對朝天宮建築的大規模整修曾調集禮部、工部和地方軍民的力量，朝天宮每年也有少量進項用以維持核心殿宇的修繕和建設。與朝天宮道士獲得持續的朝廷支持類似，西山道院的持續發展得到了劉淵然道派，特別是邵以正、喻道純一系在北京的力量的支持。這種力量不僅體現在對道院建築的維護上，也曾通過對朝天宮內宗教政治力量的平衡來反映。擁有道官頭銜的西山道院弟子，也在南京的其他道觀不斷加強對劉淵然教派的建設，如在劉淵然埋骨的南京棲真觀修建了長春劉真人祠堂，<sup>88</sup> 西山道院宗教活動的拓展有助於西山道院地位的維護。有趣的是，雖然諸多研究認為劉淵然道派的道教背景含有多種教派元素，但是道法上的相似並沒有拉近朝天宮內不同院落道士之間的關係。從朝天宮內西山道院、全真堂和道錄司建築興衰的過程來看，西山道院的發展顯然優於其餘兩所。宗派傳承在具體的宗教生活中顯然超越了名義上的正一、全真等分類法，而和具體的師徒、交誼關係聯繫緊密。

朝天宮全真堂建築的發展則體現了宗教政策和在地官員對道教事務的影響力。朝天宮從明初就確立了以龍虎山真人府正一道士為中心的管理群體，並曾經歷正一、全真道士雜處的局面，正與太祖對道教管理的設計相一致。<sup>89</sup> 在正一道士佔優勢的朝天宮，全真道經歷了艱難而緩慢的發展過程，以成化年間全真堂的建立為標誌，全真道才逐漸在朝天宮內佔有一席之地，希望形成與西山道院、朝天宮正一道士之間鼎立的局勢。但是相對而言，全真道士的社會活動範圍狹窄，修煉的方式較為鬆散、隱蔽，直到晚明才通過清淨而玄奧的修煉思想再

<sup>88</sup> [明]王直：〈長春劉真人祠堂記〉，頁427-428。此文對棲真觀的地址記錄恐有誤。

<sup>89</sup> 《明太祖實錄》，卷八十六，頁1537。

次引起文人士子的興趣。與不遠處王世貞等支持復興茅山全真道觀乾元觀類似，<sup>90</sup> 朝天宮全真堂被禮部官員葛寅亮認為是復興道教義理的支柱。全真堂在葛寅亮的一力支持下，經歷了萬曆年間短暫的輝煌。當然，禮部官員的治理思路雖然對朝天宮道教建築的發展有莫大的影響，但是僅有官員的支持，並不足以改變朝天宮內有明一代正一、全真勢力不平衡的現象，特別是在正一背景較強的南都官方道觀，為全真道士爭取一席之地之進程顯得更為緩慢。全真道士為了在全真堂立足，甚至藉助明初高道建立了新的充滿政治意味的宗教傳統。直到明末，南京僅有的全真宮觀只有搬遷後的全真堂，與全真堂傳統相續的叢霄道院建立的時間很可能晚至清初。到了清代，城內也僅多洞神宮一處重要的全真道觀，這一發展趨勢正與明代全真道在朝天宮備受壓制的狀態相呼應。

與全真堂類似的，南都道錄司建築在晚明也經歷了持續的衰敗，這主要與道錄司政治功能的喪失有關。明初的朝天宮，為朝廷儲備了大量宗教人才，道錄司官員多從中選用。但隨著南京城市政治地位的下降，朝天宮高道逐漸流失。從景泰年間開始，道士出身的官員與儒家官員之間的分歧加劇，明中晚期禮部漸漸回收道錄司自主管理權，南京道錄司道官的重要性再次降低，道錄司缺員的現象較嚴重。從朝天宮道錄司建築的發展過程中，即可窺知這一趨勢。原本十數楹的道錄司建築，到了葛寅亮任職期間已經僅剩正廳三楹。並且在道錄司建築傾頹嚴重的狀況下，政府並未主導重修的工作，而是由普通道士私下將道房劃作官署之用。其受忽視的程度可見一斑。重修後的道錄司，偏處冶城山東側一隅，與東山密集而熱鬧的景觀建築形成鮮明的對比。在朱之蕃的《金陵圖詠》中，他盛讚朝天宮建築景觀的功能：「(冶城山)右麓今建朝天宮道院，緣山之高下，最稱盛覽」。<sup>91</sup> 晚明的朝天宮東山，政治的意味逐漸降低，景觀的意味愈發顯露。正與朝天宮整體政治地位下降，而宗教空間逐漸世俗化的過程相一致。

<sup>90</sup> 王崗：〈明代江南士紳精英與茅山全真道的興起〉，收入王崗點校：《茅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下冊，頁698–752。

<sup>91</sup> 《金陵圖詠》，頁39。



晚明朝天宮部分建築維持的困難還與南京道教的經濟狀況有關。與佛教叢林多受信徒的支援不同，朝天宮的公產幾乎都來自明初欽賜。卓發之在為崇禎年間搬遷後的全真堂撰寫募田文時曾感歎：「浮屠氏叢林天下鱗次，而全真之接眾者江左缺然。」<sup>92</sup>正是南京明代佛盛道衰，而全真尤衰的經濟局面的真實描寫。不僅如此，朝天宮公產的經營狀況也不容樂觀，原宮產烏龍潭被撥予下院靈應觀。距離遙遠的太倉莊等長期處於與佃農的糾紛中，道觀與地方政府的經濟衝突不斷，萬曆初年的財政改革更讓宮糧收入雪上加霜。成化年間，朝天宮修建尚能依賴公產收入補貼所需，到了晚明，朝天宮的財政結餘已經很難應付類似的修繕工作。這不僅是朝天宮，也是南京整體道教經濟狀況的寫照。在葛寅亮《金陵玄觀志》中所統計的六十六所道教宮觀中，隸屬於道錄司的有五十五所，但只有大、中、小各一所道觀擁有公產，與南京佛寺經濟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似乎可以解釋南京道錄司為何無法依靠所屬道觀的納銀而生存，道教整體經濟狀況的衰落使得朝天宮的發展也陷入了更加孤立的境地。

雖然朝天宮建築的整體發展，受到諸多不利因素的影響。但是總體而言，朝天宮依然是明代江南地區最為重要的官方道觀之一。不僅明代諸多高道曾出身南京朝天宮，同時北京道錄司所在朝天宮也是仿南京朝天宮的形制而建：「南京洪武初建朝天宮於皇城之西，以奉上帝，以展祈報。北京肇創之初，蓋制未備，比命有司，祇循令典，得吉卜於都城之內西北隅，遂仿南京之規，創建宮宇，靚深亢爽，百物咸具。」<sup>93</sup>可知南京朝天宮的建築形式是明初官方道教宮觀的範本，對北京的重要道教宮觀也有所影響。<sup>94</sup>

<sup>92</sup> [明]卓發之：〈全真道院募田疏〉，《滄籬集》，卷十四疏，《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07冊，頁545-546。

<sup>93</sup> 〈御製朝天宮新建碑〉，《宛署雜記》，卷十八，頁195-196。

<sup>94</sup> 關於北京朝天宮的研究，參見李緯文：〈明代北京朝天宮規制探討〉，《中國建築史論匯刊》，第1期（2018），頁90-101。

## 結語

由於南京長久以來的城市佛教文化傳統，城市道教的發展的確在規模上遜於佛教。朝天宮的宮觀建築群是明代南京城市道觀中不可多得的重要案例。時至今日，它依然是江南地區官式建築的典型。明初朝天宮建築的發展，為朝天宮此後的規模和形制奠定了基礎。其以主軸的道觀建築為核心，下轄西山道院、全真堂、道錄司和卞忠貞公祠的特殊建築規制，是明初大型官方道觀宗教生活的真實寫照。朝天宮建築既是明代道教思想和皇家信仰生活的反映，也體現了微觀宗教環境中教派競爭和宗教權力變遷的複雜過程。通過考察朝天宮建築興衰的歷史細節，可以更為深刻地把握明代官方道觀建築發展的狀況。

隨著咸豐三年太平天國攻克南京，朝天宮被逐漸改造成生產、儲存火藥的作坊。<sup>95</sup>這一轉變和同治初年李鴻章(1823–1901)將朝天宮建築改造成江寧府學一道，使得朝天宮的道觀屬性逐漸退出歷史舞台。李鴻章、曾國藩等陸續修建的崇聖殿、尊經閣、明倫堂、宮牆、泮池、名宦、鄉賢、忠義、孝悌等祠，使得朝天宮學宮的性質掩蓋了原本道觀建築的屬性。朝天宮文化屬性的改寫對其道觀建築的保存影響深遠，民國時期的朝天宮，更是將尊經閣、顧亭林祠等建築拆除，改建為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庫房。<sup>96</sup>此後對朝天宮的修繕，多是按照清代學宮的思路進行，曾經的宗教建築遺跡在如今的朝天宮建築中已經較難尋覓了。但實際上，朝天宮附近的道教影響力並沒有就此湮滅，以冶山道院為名的建築記憶仍留在今日城市地圖上，怎樣調和朝天宮建築群的宗教記憶和現實需求之間的關係，今後依舊會是城市建築研究和修復中的重要議題。

---

<sup>95</sup> 吳蘭：〈朝天宮歷史沿革與建築特色〉，頁16。

<sup>96</sup> 同上註。

## Changes in the Architectural Pattern of the Chaotian Palace in Nanji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He Yanran

### Abstract

The Chaotian Palace in Nanjing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ficial Daoist temples in the Ming Dynasty. Its long and rich history and complex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determined the complicated nature of its architectural pattern. The coexistence of newly-built structures with earlier architecture in the Chaotian Palace was influenced not only by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religious sects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also reflecte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visions of how Daoism was to be managed. Howeve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in religious and historical studies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aotian Palace in this period. By examining changes in the architectural pattern of the Chaotian Palac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thus clarifying its history, this study hopes to reveal the multipl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architectural patterns of Chaotian Palace and factors such as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Keywords:** Nanjing, Ming Dynasty, Daoism, Chaotian Palace